

普希金与翻译

于娜

(西安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和地位的诗人,在诗歌、小说及戏剧等方面都颇有建树。而鲜为人知的是,以“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闻名于世的普希金对俄国译坛也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拟从普希金的生平创作、普希金的翻译观以及普希金与中国翻译三个方面来分析普希金对翻译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普希金;生平创作;翻译观;中国翻译

1 普希金的生平创作

1799年6月6日,普希金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其父亲家庭为俄国最早的贵族之一,其母亲是“彼得大帝的黑孩子”的孙女。诗人后来一直以其“六百年的贵族身份”以及他的非洲血统而自豪。诗人的童年主要在莫斯科和莫斯科近郊的扎哈罗沃村度过,自幼接受的就是三种并行的教育,即外国人充当教师的家庭教育、以外祖母和奶娘为主的民间语言和民间文学的教育以及以伯父和父母为主的诗歌鉴赏与创作教育,这些教育对普希金日后的创作传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普希金的父母都是痴迷的文学爱好者,家庭沙龙中的常客有著名作家卡拉姆辛、诗人德米特里耶夫、巴丘什科夫等。普希金自幼便熟练地掌握了法语,知晓许多俄罗斯民间故事,阅读了不少世界名著,同时尝试写作诗歌、寓言和小喜剧等。1811年10月至1817年6月,普希金就读于彼得堡郊外的皇村学校,此时即已开始写诗。

1817年6月至1820年5月,普希金完成学业后在彼得堡外交部供职。其间,诗人频繁出入于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在沉湎于“享受”之时,诗人的思想迅速成熟起来,“绿灯社”等团体出现在他的政治世界里。尽管诗人与秘密组织的成员关系异常密切,却从未参加过任何秘密组织。在此期间,诗人的艺术世界仍然十分丰富,文学团体、文学沙龙以及剧院中经常活跃着他的身影,并正式加入文学团体“阿尔扎马斯社”和“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同仁会”。《自由颂》、《致恰阿达耶夫》、《乡村》等革命倾向明显的诗歌就创作于此时。这些诗歌广泛在十二月党人之间流传,普希金“十二月党人运动的歌手”之称也由此而来。

1820年5月,这些带有革命倾向的诗歌触怒了当时的当权者,随即招致了诗人的第一次政治流放,即南方流放。在直到1824年8月的四年多的时间里,诗人的足迹遍及赫尔松、尼古拉耶夫、敖德萨、基辅等地,这里的群山大海激发着诗人的才情与灵感,尤其是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亚逗留的两个月,可以说是诗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段之一。也正是在这几年的流放期间,诗人写下了《高加索的俘虏》、《巴赫切萨拉伊的泪泉》以及大量短诗,同时开始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创作。1824年8月,普希金突然被衙门开除,并被发配到母系的世袭领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这次贬黜行动的借口是一封被警察机构截获的私人信件,诗人在这封信中表达了亵渎上帝的观点。自此诗人又开始了第二次流放,即北方流放时期。

1826年9月,诗人的北方流放生活结束,重返阔别15年的莫斯科。1827年5月,又回到离别七年的彼得堡,从此便往返于新、旧两都之间。1830年秋,普希金前往父系世袭领地波尔金诺村办理分产手续,因交通被阻断而在此滞留两个多月,这两个月的滞留期后来也成为诗人一生中最丰产的时期,即文学史上被称为普希金的“波尔金诺之秋”时

期。诗人最著名的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三章就写于此期间,除此之外诗人还完成了包含五个短篇的《别尔金小说集》、四部小悲剧以及十七封书信等的创作。

1831年2月,诗人与娜塔莉娅·冈察洛娃组建家庭,不久就迁居彼得堡。诗人的婚姻一开始似乎是幸福的,但夫妇两人并不情投意合。娜塔莉娅浅薄冷漠,还很琐碎,近乎庸俗,全无任何智性或诗歌兴致。娜塔莉娅的美貌使她在彼得堡大获成功,无论在城里还是在皇宫。1834年为能邀她参加宫廷舞会,沙皇任命普希金为“宫廷侍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由于政治上的失意、经济上的窘境以及有关妻子的传言令诗人十分痛苦。因此当荷兰公使的义子、法国人丹特士与娜塔莉娅的绯闻不断时,诗人忍无可忍,提出决斗。1837年1月27日,在决斗中普希金中弹,两天后在彼得堡的滨河街12号寓所逝世。2月初,诗人的灵柩被安葬在普斯科夫省圣山镇修道院母亲的墓旁。

2 普希金的翻译观

虽然普希金留下的有关翻译的作品不多,但普希金特别关注翻译,而且他是从俄罗斯文学的深度和广度来衡量翻译问题的。在论及普希金的翻译观之前应该指出的是,在论及翻译史的时候,不可避免要涉及文学史,二者之间存在着共荣共衰的关系,普希金时代的俄罗斯翻译史也是普希金时代俄罗斯文学史的一部分,因此普希金有关翻译的论述也就显得至关重要。以下笔者将主要从普希金的总体翻译观、诗歌翻译观及散文翻译观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2.1 总体翻译观

17—18世纪,俄罗斯翻译理论家受法国译风所影响,以“饰文”、“纠正”原文为荣,而普希金严厉批评这种风气。普希金所提倡的翻译是尊重外国读者的特点,同时又反对逐字死译。因此他一方面要求在意义方面忠实原文,另一方面又倡导保留原著的特色。不同于18世纪俄罗斯翻译家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总是千方百计与欧洲盛行的惯例联系在一起的风气,普希金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总是从各种翻译方法历史发展的角度,以整个文学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来审视各种翻译方法。

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罗斯译坛出现了改写原著的倾向,译作中出现了大量俄罗斯特有的文化细节,把读者完全引入俄罗斯环境。虽然在普希金早期关于翻译问题的言论中也涉及这一倾向,但后来随着思想的发展,在普希金看来,把原作的发生地点移植到俄罗斯来会丧失民族特点。

在普希金有关翻译的言论中从始至终都贯穿着翻译难的思想,他曾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这一点。当戈利岑把普希金的诗歌译成法语时,普希金曾写信给他:“……您献身的这种文学门类是,我知道的所有门类里最困难和最吃力不讨好的一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出普希金的翻译目的:把“纯粹的”翻译与“令人愉悦”的翻译、对外国文学作品

的改写、“使之适应俄罗斯习惯”对立起来。

18世纪最后几十年,随着翻译文学和本国文学“分家”过程的进行,追求译著尽量贴近原著的思想渐露端倪,而到了俄罗斯文坛一代巨擘普希金锋芒毕露的时代这种追求已经昭然若揭了。在19世纪俄罗斯文坛及论及翻译问题的人中,普希金关于翻译与文学关系的共同问题的议论最明确。他并不笼统的否认翻译的可能性,而是不同意逐字死译,反对用“相应的词汇”来表达,且坚决反对改写外国作品。

普希金的翻译观随着岁月的推移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最后得以“理论化”。在普希金逝世以后,在他的遗稿里发现一篇未完成的文章,其中大量涉及翻译问题。1837年,在普希金逝世五年后,这篇名为《论弥尔顿和夏多勃里昂所译的〈失乐园〉》的文章才首次刊登于第五期的《现代人》杂志上。此文在俄罗斯文坛引起极大轰动,直到今天,凡是论述翻译历史的文章和专著几乎没有不提及这篇文章的。

毫无疑问,普希金对俄罗斯翻译事业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影响不是指他为数不多的译著,也不是指他的理论观点,而是指普希金开俄罗斯文学和俄语的先河。在他之后,俄罗斯翻译历史,包括翻译思想登上了新的舞台。

2.2 诗歌翻译观

在诗歌翻译方面,总的来说,普希金译著不多,且几近创作。因为在译著中普希金是用他自己确立的俄罗斯标准语来再现外国原著的。普希金一生中先后翻译了17—18世纪法国诗人的讽刺短诗、伏尔泰和帕尔尼的诗歌、帕尔尼长诗的片段、安德烈·谢尼耶的部分诗歌及古希腊若干抒情诗、贺拉斯的颂歌、阿里奥斯托长诗的片段、接近民间口头创作的密茨凯维奇的叙事诗《布德累斯和他的儿子们》、《镇守客》,以及长诗《康拉德·华伦洛德》的序言、《古兰经》的片段以及《圣经·雅歌》的片段等。由此可见,普希金选材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他致力于翻译不同时期具有特色且非常典型的诗作。

至于普希金的诗歌翻译风格,在他创作的鼎盛时期,他的译作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的特征:注重典型,概括反映原著的历史特征和个性特征。他所译的17—18世纪法国诗人的诗作常被看作是与原著的争雄之作。以翻译帕尔尼的讽刺短诗为例,普希金对原作冗长的部分加以删节、改写和重构。例如《忠告》——一首平庸的祝酒诗,在普希金的笔下被译成了一首颂扬青春活力的生机勃勃的赞歌。

而在普希金创作的成熟期,在对待与他同时代的大诗人以及历史上的大诗人,如谢尼耶、贺拉斯等人时,以及对待民间口头创作方面,如《西斯拉夫民族之歌》方面,普希金一改往日译风,特别注重保留和突出原著的地方色彩以及历史色彩,有时甚至通过保留原著的形式来强化这些特征。

2.3 散文翻译观

在散文翻译方面,普希金多涉及的是回忆录以及历史作品,如《莫洛-杰-勃拉泽准将见闻录》、《铁面具》、伏尔泰的《路易十四的百年史》片段、民族志学《约翰·特纳札记》以及一些在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普希金的散文译作非常具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与他原创的散文一样,表现出他创作全盛时期炉火纯青般的技巧。如在翻译《约翰·特纳札记》的片段时,普希金不是对原作进行逐字翻译,而是在有些地方为了避免原文的啰嗦,删去了他认为冗余的句子,并且偶尔用概括的转述来代替翻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这不是翻译文学作品,而是翻译具有认知意义的、以片段形式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

然而,普希金在转达其中有关历史、日常习俗以及人类学的特点时,是紧扣原文的。除此之外,普希金还及其重视译作的风格,如在翻译《莫洛-杰-勃拉泽准将见闻录》时保留了旧式的叙事方法,使译文带有学究式的凝重。而在翻译《约翰·特纳札记》时则可以看出译笔的朴实、简练。总而言之,这一切都与普希金的行文原则相符,即遣词造句准确,文字简朴、清晰、流畅等。

3 普希金与中国翻译

普希金的名字是我们中国广大读者非常熟悉的,他的作品也是最为我们所喜爱的,提起普希金,广大读者脑海中浮现的一定是他的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然而普希金最初却是以小说家的身份被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究其原因,这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以及普希金小说的主旨密切相关。

晚清时期,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开始倡导小说革命,五四时期翻译外国小说蔚然成风。

我国最早的一部汉译普希金小说是他的历史小说——《俄国情史》(今译名为《上尉的女儿》),远在1903年就已出现,译者戢翼翬。汉译本《俄国情史》在中国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正式接受普希金小说的开端。然而从译文来看,译著与原著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是一部译述之作。

1924年12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普希金小说集》是我国第一部普希金小说集汉译本,译者赵诚之。张铁夫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全的小说选本”。此部小说集的出版在当时填补了外国文学这一领域的空白。

截至1924年,我国对普希金小说的汉译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汉译本所依版本之多样性。如《上尉的女儿》,不仅有从俄语直译而来的版本,还有根据日译本、英译本转译而来。二是一书多译。如小说《射击》一文,就有赵诚之、毋我及沈颖等多个译本。三是同书异名。如《俄国情史》与《甲必丹之女》,皆为今译名《上尉的女儿》之版本。四是非完全译本。如陈景韩版《俄帝彼得》、孙照版《回乡》等均为节译。

1925年陆士钰首次完整的译出了普希金的诗歌《感叹》,从此我国对普希金作品的翻译开始转向小说翻译,诗人普希金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放射出迷人的光芒。

4 结语

普希金的翻译观从方方面面都为19世纪的俄罗斯诗歌、散文翻译提供了典型范例,并为俄罗斯翻译史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普希金对俄罗斯翻译史发展影响的伟大之处,不仅体现在普希金的翻译观本身,更在于在普希金的推动下,俄罗斯翻译得以从文学中分割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参考文献:

- [1]《普希金全集》,十卷本第十卷,莫斯科,1952: 869.
- [2]《俄苏翻译理论流派述评》/吴克礼主编.一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 [3]平保兴.中国早期翻译的普希金小说[J].寻根,2015(01):34-39.
- [4]张铁夫:《普希金与中国》

作者简介:

于娜(1999-),女,汉族,甘肃天水人,西安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